

【周扬研究】

# 论周扬文学观的“变”与“不变”

——以《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对五四新文学的阐释为例

崔 谦

**【摘 要】**身兼艺术家和政治家,周扬的文学观经常会带有某种复杂性。他有时会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坚持文学个性;有时则会因外部因素影响而“调整”自己的观点。倘若将周扬延安时期未公开发表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与其前后见诸报端的文章相比较,可以明显发现这一现象。其中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斗争”“现实”“大众化”关系的论述明显延续或发展了周扬此前的认识;又如受《新民主主义论》影响,他不仅采用了评论文学的新方法,而且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评价也与之前有所区别,甚至还有一些新提法;再如他同时期或稍晚时候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五四新文学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理解,对郭沫若、胡适等人物的评价,都与这篇讲义有所不同。

**【关键词】**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五四新文学;文学观

**【作者简介】**崔谦,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23.11.88~107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22年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科教协同育人科研重点项目“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22KJXTA02)和2023年陕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学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编号: SXGERC2023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中,周扬堪称一位重要且复杂的人物。其重要性体现在周扬不仅是一位长期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理论家,还是一位长期承担阐释、宣传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职责的领导干部。双重身份在确立了周扬的文化和政治地位的同时,也造就了他思想的复杂性。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二者会在周扬的思想中发生“冲突”,让他随着时间、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变化,对同一问题表现出或基本一致、或差异细微、或截然相反的认识。因此,周扬也曾经被后世的研究者形容为“摇荡的秋千”<sup>①</sup>。此前,许多学者聚焦于周扬当代文学时期的这一表现,例如他1950年代末与毛泽东关于当代文学方向的分歧,1960年前后和1980年代初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

反复态度,作出过深入、精当的分析。<sup>②</sup>倘若将视线向前推移,可以发现,延安时期周扬的文学观同样存在这种“变”与“不变”。

延安鲁艺成立后,周扬除了担任学院的行政职务,还负责了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期间他撰写了授课讲义——《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sup>③</sup>(下简称《提纲》)。文中,周扬结合自己的认识与经历,从“社会-历史”层面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简明扼要的论述,对其成绩与局限性也做了独到的评价。总的来说,《提纲》保留了更多周扬个人的“原生态”思考,也更显他的理论个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写作、讲授《提纲》期间,恰逢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sup>④</sup>也正是因为如此,假如将这篇讲稿与周

扬在其前后正式、公开发表的文章相比较,可以发现一些观点和表述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或模糊、或明显的异同:

第一,《提纲》的一些内容明显延续了周扬此前的思考,不仅表述与之接近,还对其做了完善和深化;第二,结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论断,周扬在《提纲》里已经形成了一些新观点,或修改了之前的某些认识;第三,《提纲》的某些表述与周扬同期或稍晚时公开发表的文章相比,存在有明显差异,甚至是矛盾。由此可见,周扬作为一名优秀理论家的才情,以及向主流政治靠拢的努力,在这篇文章中是同时存在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扬思想中“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sup>⑤</sup>相互交织、搏斗的复杂、矛盾状态。

### 一、“斗争”、“现实”与“大众化”

作为一种具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帮助中国新文学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反映、书写革命斗争的作家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自步入文坛起,周扬对它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0年代初,周扬不仅译介、整理了大量苏联或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前沿动态与理论“热点”,也努力地将它们内化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期间,“斗争”“现实”“大众化”逐渐成了周扬持续关注、思考的“关键词”。《提纲》里,周扬对以上话题除了沿用了自己已有的表述,也作了补充或深化。

对周扬来说,他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文论独有的斗争精神,也希望新文学能增强这种品质,从而推动现实中革命的进程。早在1931年,周扬就在《绥拉菲莫维奇》中对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作品和亲身参与斗争的作家示以了由衷赞赏。之后,周扬对于文学与斗争关系的考量,逐渐落脚到了以下三个方向上:第一,是试图为斗争这一抽象概念赋予反帝反封建的具体内涵。1936年,周扬回顾新文学的发

展时说:“沿着中国社会解放运动的基本的道路,反帝反封建的道路而前进,作为历史现实之真实反映的文学,也就是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充满生气色彩丰富的图画。”<sup>⑥</sup>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周扬第一次用反帝反封建去界定文学中斗争的内涵。第二,是他把是否准确反映了斗争,当成了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例如他在评论《雷雨》和《日出》时,虽然肯定了它们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却又就人物身上的斗争性,给予了二者相反的评价。他认为作家带着悲悯的感情去表现《雷雨》中的人物,使这种感情最终化成了一种愤懑,成了“对于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斗争的发条”,因此“《雷雨》的最成功的一面是人物”。<sup>⑦</sup>面对繁漪、鲁大海这些具体的形象,周扬同样着眼于人物与斗争的关系,对他们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sup>⑧</sup>但评价《日出》时,周扬却认为曹禺“并没有照出着社会层的斗争地去描写”<sup>⑨</sup>里面的人物,这导致该作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表现完整的社会形态的目的。第三,周扬认为“现实的历史的运动和斗争是新的美学的基础”<sup>⑩</sup>,因此表现斗争应当是未来新文学美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提纲》中,周扬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斗争关系的表述依旧从上述三个方向展开。引言部分,周扬首先阐明了新文学运动和现实斗争之间的关联,指出它“不但和广大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而且和劳工运动,农民斗争密切联系着”<sup>⑪</sup>,其根本内容和内在趋势都是作为“思想斗争的一种武器”<sup>⑫</sup>,服务于中国革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四以来的文学均可被看作是对民族和社会斗争的反映。其次,斗争也是周扬评价五四前后的文学运动、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依据。例如虽然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推进的文学变革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旧资产阶级民主的启蒙的运动”,后来其中也有人有着“保守”“反动”的转变,但由于他们和旧思想、旧文学、旧语言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为新文学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扬仍然肯定了其历史功绩,认为“他们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sup>⑩</sup>。又如周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正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文化上的体现,浓厚的战斗性也正是它能取得扫荡封建旧思想、打开白话文新局面等诸多“战绩”的保证。再如周扬认为鲁迅思想中那种“朝气蓬勃,凌厉无前的民主主义者的战斗气魄”<sup>⑪</sup>,不仅让他区别于康、梁、严、陈、胡等人,还让他的作品具备了一种“战斗气氛与光明信念”,让它们或像《狂人日记》那样,对封建制度和思想发出最有力的控告,或像《药》的结尾那样,用“平添一个花环”来“给人增加为更好的未来而斗争的勇气”<sup>⑫</sup>。第三,在总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史时,周扬最看重的是它是一段“民族斗争社会斗争之反映的历史,是文学服务于民族的大众的解放事业的历史”<sup>⑬</sup>。可以说,周扬把表现斗争当作了新文学重要的经验和成绩。而从教与学的角度上讲,教员周扬为鲁艺众学员点明这段文学史与斗争的关联,不仅是要让他们认识新文学中的这一传统,也是想引导他们将来对其加以继承和发扬,用作品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

对于文学家周扬来说,他的文学素养更多来自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对于政治家周扬来说,追求革命的成功是他行动的方向。而现实主义,则成了周扬联结二者的纽带。自1930年代初起,周扬就在努力促使文学更加具备深刻反映现实的品质。此时他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年,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中热情介绍了这一理论在苏联的产生、发展和意义,认为只有在发展和运动中去认识、反映现实,通过本质、典型的形态写出真正使大众感动的、深刻的、活生生的现实,方能把握它的精髓。其二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俄国(苏联)、欧洲取得的实绩。在多篇作品中,周扬都对果戈理、高

尔基的创作,以及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苏联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sup>⑭</sup>其三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十九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其中,车氏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述格外吸引周扬,他不仅系统介绍过其“美即生活”的理论,也有将车氏《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作为未来建设“新美学”的理论基础的构想。<sup>⑮</sup>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与现实”逐渐成了周扬文艺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宣传和推动文学反映现实,并反作用于革命改造现实的主张<sup>⑯</sup>,他也在致力于构建一个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新文学传统。《提纲》之前,周扬就多次阐述过新文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指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sup>⑰</sup>，“中国的新文学是沿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发展来的”<sup>⑱</sup>，“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无可否认地是一个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运动”<sup>⑲</sup>。《提纲》里,周扬又进一步完善了此前的结论。首先,周扬用现实主义为五四新文学和晚清文学建立了联系。例如周扬认为,王国维“有权被称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中国所有文艺评论家中之最伟大的一个”,就是因为“他的文学见解,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不少深刻的辩证的要素”;<sup>⑳</sup>而不为后世熟悉的黄远庸<sup>㉑</sup>,也是因有将文艺与现实相结合的主张,而得到了周扬的赞许。又如周扬认为“用现实手法描写当时情况”的四大谴责小说,堪称“现实主义的一个成功”;但他也指出,由于“历来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薄弱”,因而它们均有不同程度的“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表现,故不能被纳入新文学之列。<sup>㉒</sup>不难看出,周扬以是否反映现实、能否运用现实主义开展创作为价值尺度,让晚清文学与五四的文学之间自然地产生了关联,从而证明了描写现实在新文学中居于主流地位,是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其次,欧洲的各种文学、哲学思潮,是新文学勃兴的重要外因。但《提纲》中,周扬却仅强调了现实主义

对新文学的影响,而对包含浪漫主义在内的其他理论和方法却只字未提。<sup>⑤</sup>这种“顾此失彼”不仅使新文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也让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传统里无形中具备了“唯一性”的特征。通过这些论述,不但周扬关于“文学与现实”的思考更加成熟了,他还借此推动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帮助学员们意识到,围绕现实展开创作既是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是在完成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提出“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这个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而周扬正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1932年7月,周扬于《北斗》第二卷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其中,他更重视的是“怎么做”。具体来说,周扬认为大众化作品的形式尽可能要短小、通俗,既要“一时地、批评地采用旧式大众文学的体裁”,又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形式”;内容应当“描写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以及要在大众中培养“典型的革命作家”,发展一支“一面参加着大众的革命斗争,一面创造着给大众服务的作品”的新作家队伍。<sup>⑥</sup>1933-1934年,周扬在多篇讨论苏联文学的文章中,也提及了他们的大众化实践及成果。<sup>⑦</sup>之后,周扬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开始从大众化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试图为其梳理出一条与大众相结合的发展脉络。而《提纲》中关于大众化的论述,正可被看作周扬在延续他的理论探索。此前,周扬对文学与大众关系的阐述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它们大多围绕左翼和抗战文学展开,例如革命文学是站在勤劳大众立场上的,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建设抗战文艺的当务之急,是迅速而有效地使文学服务于抗战和大众,在大众的意识中树立民族革命的精神

和思想;作家需要拿出诚意与努力,把文学和大众的结合当作一个长期努力的目标;等等。<sup>⑧</sup>二是它们相对零散,也较缺乏概括性。对于理论意识极强的周扬来说,他也发现了这些问题,因此他在《提纲》中所做的工作,正是要对其加以补充,让晚清文学、五四新文学也具备与大众相结合的“先进色彩”。

1939年初,周扬首次谈及了晚清文学与大众的联系,例如严复的翻译为的正是“要叫大众不徒以西洋的皮毛为满足,而必须了解西洋的精神”<sup>⑨</sup>。无独有偶,《提纲》中周扬借黄远庸提出的新文学之要义在于“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sup>⑩</sup>的主张,再一次为二者建立了关联。虽然周扬这些引述都是几句话简单带过,但笔者认为,它们证明了自晚清起,文学就已经出现了大众化的萌芽,因而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相比,《提纲》对五四新文学与大众关系的论证则显得更为详细、深入。周扬认为,新文学描写了大众的生活、情感,表现了和大众的精神共鸣,形成了关怀大众的基本精神和传统;白话文不仅可以被看作吸收了大众日常使用的方言口语的产物,也有着“使文学工具比较能为大众所容易接受,大大地缩短了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sup>⑪</sup>的意义,这些均可被看作他“五四文学革命是在谋文学和大众结合的目标之下实行的”<sup>⑫</sup>等论点的佐证。此外,周扬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结合了许多实例,比如他认为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并非像别人误读的那样是反对大众的,而是像拜伦一样表达了对深陷“垒囚之苦”的民众的同情;又如他援引康白情的主张,认为早期白话诗有着大众的基本精神,而这堪称当时“诗歌上唯一正确的传统”<sup>⑬</sup>。借助《提纲》的讨论,周扬成功搭建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文学与大众关系的体系。在此基础上,那个不容置疑的、颇具“结论”色彩的论断:新文学运动史“是文学服务于民族的大众的解放事业的历史,是文学为更接近现实接近大众而奋斗的历史”<sup>⑭</sup>,也就自然地呼之欲出了。

## 二、对五四新文学的“重新认识”

1940年2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正式发表,文章指出五四之后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其基本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对当时包括周扬在内的理论家、批评家们来说,这些论断无疑有着权威的意义。上文说到,《提纲》的写作、讲授时间与《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有所重叠,因此,将这篇课堂讲义与周扬此前的文章相比较,可以很容易发现其中有《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子,特别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分析、评价不光与周扬之前的论述存在差异,甚至有些提法是第一次出现。纵观周扬1940年之前有关新文学各阶段的论述,可以总结出一个清晰的结论:相较于五四时期,他更看重革命文学及之后的经验。但有些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是什么原因促使周扬形成了这种“有所侧重”的观念?在笔者看来,解答这个问题不仅能说明周扬1930年代阐释五四新文学的态度,也可以解释他在《提纲》中对其加以“重新认识”的原因。

1926年,18岁的周扬转入上海大夏大学,接触到了五四新思想、新知识。其中尤为让周扬感到鼓舞并影响他人人生选择的,一是尼采的哲学,周扬坦言:“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sup>⑧</sup>在周扬看来,“上帝死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中那种彻底的反抗态度,正是五四精神的具体体现。<sup>⑨</sup>与此同时,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着极大的热情,他表示“在这些思潮中我还是最相信马克思,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最好”<sup>⑩</sup>。在这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年轻的周扬在革命的低潮期做出了投身其中的决定。<sup>⑪</sup>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诸作家,则让周扬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周扬晚年回忆说,“我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创造社’的革命影响”<sup>⑫</sup>，“我告诉郭老,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他的诗歌的忠实读者,也是他所创办的

《创造》等刊物的热心的读者”<sup>⑬</sup>。而郭沫若等人对周扬最大的影响,正在于他们身上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热烈的情绪。<sup>⑭</sup>这种狂放、高昂的青春气息,加之带有反抗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使周扬形成了“抑旧扬新”的思维模式。在1930年代初左翼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他正是以这种思维去认识、评价五四新文学的。此外,创造社在1920年代末“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主张与实践,对周扬也有着启发性的意义,它让周扬找到了一个既能发挥个人兴趣,又能实现救国理想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当时他们以新的理念和知识对五四新文学所作出的重新评判和价值重估,也从一开始就为周扬这位“在场者”划出了一个认识的“边界”。

1929年,周扬远赴日本,为自己打下了深厚的左翼文化基础。<sup>⑮</sup>进入左联,周扬开始关注世界上共产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与成果,努力地让中国的左翼文学在思想和组织上与他们建立联系。<sup>⑯</sup>他在翻译以高尔基、别林斯基、果尔德为代表的苏联、美国无产阶级文艺作品,编写译介论文的同时<sup>⑰</sup>,也将苏联文艺运动的理论、口号引入了国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国防文学”便是其中的代表。从周扬这些履历可以看出,他与五四新文化更近似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五四的时代特征让他很容易地接受了左翼文化,加入了更具反抗精神的革命队伍;而真正对他的文学活动起到指导作用的,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而周扬也是以此为标尺,衡量他在左联的工作的。因此,梳理与分析1940年之前周扬谈及五四新文学的相关内容,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总体来看,周扬对五四新文学的态度或评价,基本上都是消极或负面的。例如他认为“五四式”的白话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专利,并不是劳苦大众所能看得懂的。<sup>⑱</sup>又如谈及新文学的民主主义问题时,周扬虽然在整体上肯定了受欧洲进步资产阶级思想和西

洋文学影响产生的五四新文学有民主主义的精神和追求,但他同时也指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使之“在贪婪地咀嚼异域的文化果实时常不免同时吸进了世纪末的毒汁”<sup>④</sup>,也令其受现实里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一卷土重来”的影响,并没有为中国民主主义的文化扎下根基,而是很快成了“历史的陈迹”。<sup>⑤</sup>因此在实际影响上,周扬认为虽然五四留下了战斗的民主主义的传统,但一方面“它并没有丰厚的文学遗产遗留给我们。在创作上不用说,就在翻译介绍上,也都是很贫弱的”<sup>⑥</sup>;另一方面它遗留的斗争精神也实在“少得可怜”,只有鲁迅的著作称得上是“‘五四’以来中国民主主义的最战斗的传统”<sup>⑦</sup>。总的来说,周扬这些聚焦于五四新文学局限性的论述,不但与创造社等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偏激、强烈、叛逆的态度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还又一次强化了革命文学“克服了‘五四’的不彻底性与软弱性”<sup>⑧</sup>的进步色彩。

虽然周扬对五四新文学的不足有着诸多揭示,但他也并非要对其全面否定,而是也承认“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贯串了从《狂人日记》以来的一切优秀的作品”<sup>⑨</sup>。但具体来看,周扬更多是在民族解放、反帝爱国的层面上,去讨论上述话题的。例如他指出,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自近代以来最主要的矛盾,它让新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产生了内在的、深切的联系。因此产生于反帝爱国运动背景下的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是和反日的运动血肉相连的”<sup>⑩</sup>。同时,周扬着眼于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之间的关系,将五四以来文学中反封建的内容、主题当成了表现反帝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他明确指出:“我们承认新文化中反封建的内容占着特别显著的地位,但是封建势力本身原是被帝国主义所勾结,所扶植的,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进步的反帝的民族主义者。”<sup>⑪</sup>因此,周扬在评价周作人、康白情、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时,重点评述的是他们的作品对民族主义、爱国精神的表现。特别是评价鲁迅时,周扬认为

他是出于爱国的动机从事文艺的,那些批判、暴露本民族的病根和症结的作品,实际上自始至终蕴含着民族解放的思想,所以周扬说“没有写过一篇反帝题材的作品,无碍于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战士”<sup>⑫</sup>。其实,周扬这种解读同样有着现实的考量。1934年,周扬深感于苏联“国防文学”对中国有着示范意义,于是将其译介到国内,呼吁作家们用作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sup>⑬</sup>因此这些对五四新文学反帝精神的解读,也可看作他在呼应自己的“国防文学”主张。

1937年9月下旬,周扬被调往延安,可他的内心此时却是复杂的。因为这次迁调更像是他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在上海文艺界的威信大受影响之后的一次“无奈之举”。<sup>⑭</sup>但抵达延安后,周扬首先感受到的是当地干部群众的“礼遇”: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为他们举办了热烈的欢迎会,会上周扬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其后二人又有多次会面、书信往来,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毛泽东不仅对他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问题”闭口不谈、“既往不咎”,还对他示以了极大的信任。<sup>⑮</sup>这些都让此前略感失意的周扬有了一种“喜逢知音”的感受,也让他折服于毛泽东的胸怀,从而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情感上的认同带来的是思想上的转变。此前周扬在上海时,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加之缺乏和中央苏区的直接联系,对国内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知之甚少,甚至“只知道毛主席是位革命领袖,但对毛主席的思想不但根本不懂,在上海也看不到”<sup>⑯</sup>。所以那时他更多的是在“学苏联,看共产国际”<sup>⑰</sup>,而非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进革命文艺理论建设。而到延安之后,周扬在与毛泽东的不断交流中,更直接地接触到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理论,也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他的智慧。这最终让周扬情感上的“佩服”转变成了思想上的“信服”。

甫至延安,周扬的工作依旧是宣传理论、设计政

策,推动根据地的文学建设,但此时他意识到,自己应该主动向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靠拢,而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的文艺理论或实践了。因此对周扬来说,较为宏观却又观点明确地谈及文艺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这是一次帮他实现“理论转型”的机遇,但也蕴含着挑战,毕竟此前他还没有结合毛泽东的论断去讨论文艺问题的经验。这时,不公开发表的《提纲》就成了一个比较合适的理论实验场域:周扬既能结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论点展开阐释;又可以有弹性地去“尝试”和发挥,给自己留足“试错”余地。而周扬对自己理论所做的调整或补充,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民主主义论》在论述文化问题之前,首先谈论的是它和政治、经济的关系,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sup>⑤</sup>,正是因为五四后出现了新阶级和新经济,才产生了新文化。而这种将文化置于社会的整体系统和动态系统中,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出发讨论文学问题的整体思路,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周扬笔下。《提纲》在总结以五四为轴心前后近四十年的文学发展史时,无论是讨论晚清文学变革,还是文学革命,均是沿着“政治经济的一般情势—思想文化环境—文学本身”的顺序,以这种从社会历史到文学现象的文学社会学式研究方法展开分析的。

第二,《提纲》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民主主义性质的论述,是周扬做出的较为显见的调整。1937—1939年,周扬有多篇文章都提到了文学与民主主义的关系问题。<sup>⑥</sup>但它们对五四新文学的论述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首先是篇幅较为有限;其次是周扬将其归入了旧民主主义文化序列中,从而流露出了有所保留的态度。《提纲》里,周扬围绕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讨论,在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性质不同于五四以前,是新民主主义的”<sup>⑦</sup>的同时;又通过“文化背景—文学现象”的逻辑链条,证明了作为新

文化运动一翼的五四新文学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有着相同的历史发展轨迹<sup>⑧</sup>,因此这种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采用了白话文这种新形式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具备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而这些都使得《提纲》对五四新文学基本秉持了一种肯定的态度。

第三,虽然《提纲》中周扬对五四新文学推动反帝反封建这一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予以了充分肯定,但他其实是更侧重于从反封建的角度,去谈论新文学的文化背景、理论主张、作家作品的。例如他说到“人的文学”的进步性就在于它“正符合于反封建斗争中人的自觉的要求”<sup>⑨</sup>;《狂人日记》之所以堪称新文学“坚实精良的基石”,正是因为它“第一次在现代小说的形式上把反封建思想和白话文学真正结合了起来”<sup>⑩</sup>。相反,之前周扬关注较多的新文学与反帝斗争的关系,在此时较少提及。这种偏向实际上也是受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启发,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反帝与反封建基本上是同时出现的,可见在他看来,二者在中国革命中有着相同的地位。由此反观周扬倡导“国防文学”时,那种只关注新文学对反帝运动的意义,而忽视其反封建价值的认知,自然不难发现其中的片面性。因此周扬进行理论上的自我反拨与补充,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 三、《提纲》之后的“再调整”

综上所述,《提纲》呈现出的文学观显然带有一种“混合性”:其中既有周扬自左联时期业已形成的认识,也有受毛泽东影响形成的新观点。作为一篇讲义,这种略显“放得开”的论述自有其合理性。但对此时的周扬来说,他的某些个性化见解,只能存在于这篇用于教学、不公开发表的讲稿里;一旦见刊登报,他就要调整或隐藏理论个性,将个人的文学观纳入根据地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去,向党的文艺政策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靠拢,毕竟这既是出于工作需要,亦有他个人主观上的“偏好”。而这势必会让《提纲》与他同期正式发表的文章形成某种差异、矛盾。具

体来说,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五四新文学与中西方文化资源的关系问题上,《提纲》内外的一些表述就有明显的区别。《提纲》中,周扬指出了文学革命的两点历史功绩:一是推行了白话文和新文体,实现了文学形式的解放;二是表现了现实主义、民主主义的“新精神新内容”。而这又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新文学的“创新动力”究竟从何而来?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不单纯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对此《提纲》是这样解释的:“白话文学运动是一方面感染西洋民主主义的思想 and 文学的影响,一方面继承中国固有的文学中民间的比较民主的要素而形成的。”<sup>⑥</sup>新文学运动史是“一面继承自己民族优良遗产,一面吸收外来有益营养,一面更加民族化,一面更融合于世界文学而奋斗的历史”<sup>⑦</sup>。此处周扬充分注意到了新文学对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吸收,也肯定了它是民族与世界文学合力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但也需要看到,周扬虽然肯定了外国文艺思潮对五四新文学的正面意义,指出了如果对其缺乏正确估计,“将使中国新文学从世界文学中孤立出来,无法说明新文学的真实历史”<sup>⑧</sup>;然而在这背后,他是有一个清晰的“以我为主”的立场的。在周扬看来,新文学吸收外来文化资源,是以适不适合民族需要为原则的;并且它也离不开对本民族经验的继承与发扬。<sup>⑨</sup>例如周扬指出,白话文是吸收了民间口语与方言的产物,并且他也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新文学是古代白话文学的延续,称它是把“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学放到了正宗的地位”<sup>⑩</sup>,其在内容上对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则源于《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以及晚清“谴责小说”。

倘若将周扬的上述见解与立场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加以比对,不难发现前者有趋近于后者的痕迹。对于新文学是坚持民族特色还是依仗外来经验

形成的,毛泽东有着一贯、明确、坚定的态度。1938年,毛泽东在倡导马列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的政论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形式”的概念,称要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将其与“国际主义的内容”结合起来。<sup>⑪</sup>《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重申了此前的观点,还进一步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sup>⑫</sup>对周扬来说,这些论断无疑为他指明了文艺问题的大方向。同时,毛泽东也对周扬如何认识新文学产生着具体的影响。1939年底,毛泽东审阅过周扬的一篇文章后,在给他的覆信中这样写道:“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sup>⑬</sup>这段论述中,既暗含了毛泽东对文化上一味追随西方的不认可,也给如何理解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怎样建设未来的文学这些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向民间学习、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但对于把控诉与否定包括农村在内的传统中国当作主题之一的五四新文学而言,这里的价值重估可谓极具颠覆性,毕竟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它是受以启蒙主义为代表的欧洲文艺思潮的影响形成的,并且客观上还对上述主题的出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周扬那篇让毛泽东主动提出看法,并作了数十处修改和批注的文章,正是发表于1940年《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作为一篇与《新民主主义论》同期发表、且是讨论其中的重要话题——“民族形式”的文章,周扬自然在毛泽东精细的批阅背后,发现了他的良苦用心。受毛泽东启发,周扬在这篇文章中从形式问题入手,表达了对新文学与中西文化关系的新看法。在他看来,对致力于表现民主主义的新文学来说,采



用并发展新形式,是非常必要的;但自五四开始,它就是经由“改造”实现的。一方面,周扬不回避新文学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但也指出它绝非“全盘西化”的产物,无论是引进外国的词汇与语法,还是写作方法与体裁,都是基于实际需要做出的选择,而它们“在中国特殊环境中具体地运用了之后,也就不复是外国的原样,而成为中国民族自己的血和肉之一有机组成部分”<sup>⑤</sup>。此处,他不仅批评了那些常用晦涩难懂的欧化句子,并以此自炫高深的作家;更以鲁迅为例,指出《狂人日记》等小说虽然深受果戈理等外国作家影响,但其人物、世态与风习,以及描写的笔调,却是“十足的中国式的”。另一方面,周扬指出新文学在艺术和思想上同样利用和改造了民间旧形式,是“把章回小说改造成了更自由更经济的现代小说体裁,从旧白话诗词蜕化出了自由诗”<sup>⑥</sup>。

从周扬这些谈论五四新文学和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文化关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认识明显有一个由“利用”到“改造”的变化。特别是周扬对五四时期文学改造旧形式的论述,倘若与他此前提出的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应当继承旧形式的倡议<sup>⑦</sup>联系起来,无形中正为新文学梳理出了一条“继承改造旧形式”的脉络。对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他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肯定、到有保留地肯定、再到有条件地肯定的过程,最终定型为了: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主动改造外来资源,进而完成自身建设的。过去那种五四时期是直接引入、借鉴、运用外来理论、实践建设新文学的观念,也就彻底不复存在了。<sup>⑧</sup>

其次,自1940年起,政治上的进步与否优先于文学上的贡献,成了周扬对作家、理论家表示肯定或批判态度的主要依据。通过对比《提纲》内外周扬对五四新文学发起者、倡导者、参与者的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这些人中,被周扬先后论及次数最多的是鲁迅,其次是胡适、周作人,再次是郭沫若、

陈独秀。其中,周扬对鲁迅、郭沫若的评价表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而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的评价则有明显的“反差”。

1936年鲁迅逝世后,延安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鲁迅随即也在当地达到了近乎深入人心的程度。而周扬对鲁迅示以高度评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1937年,周扬在总结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时,第一次对鲁迅做出了较高评价,称鲁迅作品的出现堪称新文学“有力的开始”,它“替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放下了第一块基石”<sup>⑨</sup>。1939年,他又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中,高度肯定了鲁迅及其作品中的爱国精神、民主主义与现实主义方向,以及与大众的结合。到了《提纲》里,周扬除了沿用上述观点之外,更是直接援引了《新民主主义论》中“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等论断,向鲁迅致以了更高的赞誉,称“这个文学巨人一生所走的道路,从急进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从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到共产主义思想,正标示了新文学发展之必然的趋向”<sup>⑩</sup>。此后,周扬对鲁迅的评价已基本定型,1941年发表的《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中所论述的鲁迅的反抗精神,与大众、尼采、高尔基的关系,基本上都与此前相差无几。

虽然周扬青年时期受了郭沫若很大影响,但1940年代之前他却鲜有对郭沫若的评论。特别是《提纲》在论述五四新诗时,仅具体讨论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人,只在结论部分的最后用一句话提到了郭沫若的贡献。<sup>⑪</sup>之后周扬对郭沫若致以高度赞誉,同样与当时的文化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1938年,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sup>⑫</sup>1941年11月16日,经周恩来等人的大力倡导和精心

筹备,国内多地举办了盛大的郭沫若五十诞辰庆祝活动,仅在重庆就有2000余人参会。<sup>③</sup>而周扬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就发表于当日的《解放日报》上。文中,周扬盛赞了郭沫若和他的作品,称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sup>④</sup>周扬还以《天狗》《凤凰涅槃》等作品为例,指出它们融合了“自我的歌颂,民族的歌颂,大众的歌颂”<sup>⑤</sup>,从而证明了郭沫若身上具备着强烈的“革命性”。总的来看,周扬对鲁迅、郭沫若表示出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是因为他们曾经的成绩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当下受到认可与推崇的“进步作家”,具有着“文化风向”引领者的特殊身份。

相较于鲁迅与郭沫若,周扬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的评价可谓急转直下。1930年代末,周扬尚能基于实际贡献,给予他们正面的评价。例如周扬指出胡适、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肇始者,很早就提出了鲜明、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sup>⑥</sup>胡适、周作人不仅有着民族主义的思想,五四时期翻译了许多激发民族自尊心的作品,他们还都产生过接近社会主义的思想,创作过歌颂劳工的诗作,甚至胡适对十月革命也有过热忱的欢迎。<sup>⑦</sup>《提纲》中,周扬在对他们表示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评价可谓更加客观、公允。但是毛泽东对上述三人的认识,却与周扬明显不同。《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欧美派的文化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表示了明确的否定或批评态度,而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恰好可被看作这三类人的代表。因此,他们虽然曾经在五四时期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其政治身份却使之无法被已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一部分的五四新文学认可和接纳。受此影响,周扬也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评价角度,通过指出他们政治立场上的落后性,进而淡化其对文学革命的实际影响。例如他说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元勋,实际上是“消

极的一面居多”,因为他的理论堪称是“一种自然主义再加上一点唯美主义的半生不熟的杂凑”,其主张有着一贯的“自相矛盾与不彻底”,而这种矛盾正与他哲学见解上的二元论、后来政治上的动摇与变节有着一脉相通的地方;新文化在尚未战胜旧文化时,就出现了内部的分裂,代表“西洋物质文明破产的绝叫”一派的改良主义、好人政府主义,正是民主主义向封建主义投降的表现,而这些皆是胡适曾经推行的主张;曾经大力倡导“人的文学”的周作人,如今却俯首帖耳于强盗统治之下,成了“‘非人的文学’的‘帮闲’”。<sup>⑧</sup>

“历史现象是一个多元决定的现象。”<sup>⑨</sup>将这部略显特殊的《提纲》与周扬之前、之后的文章相比较,最终呈现出的“变”与“不变”,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对于我们后辈研究者而言,不应只就其文其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表现,就武断地给出某种评价,而是应该“重返历史现场”,既看到周扬的观点、主张,也要抽丝剥茧地去探寻他这种观点、主张是如何形成、发展的,这样方能更好地理解周扬的探索与选择,进而对其有一个更加客观、历史、辩证的认识。

#### 注释:

①参见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序言,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②1958年之后,周扬对当代文学方向的理解接续了他左联时期的主张,从而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差异。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157页;洪子诚《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1960年前后,周扬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态度明显有“不认可—认可—不认可”的反复,但“文革”后他又对此表示了支持。参见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同舟共进》1998年第6期;童庆炳《周扬晚期的文艺思想》,《文艺研究》2009年第10期;刘锋杰《周扬文艺思想的一个转变——从“特殊规律论”到“共同规律论”》,《江淮论坛》2019年第6期。

③在周扬的著述中,《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这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文中只宏观地介绍了新文学从晚清到五四的发展,但之后的内容,周扬尚未写出。其次,《提纲》既未单独发表,亦未被收入1984年版《周扬文集》。“文革”中,该作被当作“黑材料”存入周扬档案,直到1986年才被“发掘”,发表于《文学评论》。其三,周扬未注明具体的写作时间,《文学评论》“编者按”也只说它大致作于1939—1940年间。

④关于二者在时间上的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结论:有学者认为“1939年周扬在鲁艺讲授这门课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还没有正式发表”,其中一些内容“还来不及参考或照搬毛泽东的有关论断”(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可见《提纲》部分内容完成于1939年。也有学者将其中一些论述与周扬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的文章进行对比,得出它“应该在1940年以后书写而成”的结论。(彭民权著《周扬与新文学史的书写范式》,《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在笔者看来,讲义不同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作者可以随时调整内容。因此无论参照哪种说法,《新民主主义论》对其写作、修改、定稿造成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⑤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4页。

⑥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周扬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⑦⑨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周扬文集》一,第201、207页。

⑧周扬认为虽然繁漪缺乏行动纲领与力量,但她的性格仍是“最有斗争性的”;他同时认为曹禺对鲁大海的描写是完全失败的,因为他对周朴园的斗争没有集中在社会层面上,导致作品没有能“把家庭的破裂在社会斗争(罢工)的背景下开展”。参见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周扬文集》一,第203~205页。

⑩周扬:《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对于梁实秋和朱光潜两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周扬文集》一,第224页。

⑪⑫⑬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⑭⑯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

第1期。

⑰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⑱《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1933)、《高尔基的浪漫主义》《果戈里的〈死灵魂〉》(1935)、《现实主义试论》(1936)等文章均是对这一问题的专论。参见《周扬文集》一。

⑲参见周扬《艺术与人生——车尔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对于梁实秋和朱光潜两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周扬文集》一。

⑳例如周扬曾明确提出“我们要用文学这个武器在群众中向反动意识开火,揭穿一切假面具,肃清对于现实的错误的观念,以获得对于现实的正确认识,而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去革命地改变现实”。参见周扬《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周扬文集》一,第34页。

㉑周扬:《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周扬文集》一,第226页。

㉒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周扬文集》一,第236页。

㉓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周扬文集》一,第271页。

㉔㉕参见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㉖黄远庸(1885—1915),又名黄远生,其文有“洞朗轩辟,幽隐毕达”之誉,1915年被暗杀于美国旧金山。

㉗早在1937年周扬就提出:“差不多所有‘五四’以后的优秀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可见他早已形成了这种价值立场。参见周扬《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周扬文集》一,第226页。

㉘参见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周扬文集》一,第26~30页。

㉙参见周扬《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1933)、《高尔基论文学用语》(1934)等文章,《周扬文集》一。

㉚参见周扬《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现阶段的文学》(1936)、《抗战时期的文学》(1938)、《我们的态度》(1939),《周扬文集》一。

㉛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周扬

文集》一,第269页。

①⑤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②③④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⑥周扬:《我的自传》,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

⑦参见荣天琦《人生难得一知己——周扬与周立波》,《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

⑧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⑨周扬第一次入党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在自传中回忆到:“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1927年对革命的极端颠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周扬:《我的自传》,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第190页。)可见尼采哲学也对周扬投身革命的历史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

⑩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

⑪周扬:《悲痛的怀念》,《人民日报》1978年6月18日。

⑫周扬回忆郭沫若时说:“郭沫若是感情非常丰富的,那时候我们受郭沫若的影响,也是在这个丰富的感情上受的影响。”参见周扬《尊重历史,给历史人物以应有评价》,《人民日报》1983年8月30日。

⑬谈及这段经历时周扬说:“在东京我拼命地看左翼文艺书籍,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通过日本丸善书店,看到和买到很多左翼英文书。”此外,他与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松本正雄也有着密切联系。参见吴敏《周扬年谱初编(一)》,《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⑭笔者认为,周扬对译介“国防文学”目的的阐述颇能说明他当时的想法,也能说明时任左联领导的周扬是很注重主动与苏联文艺建立联系的:“我们认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提倡‘国防文学’,我们这个国家民族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能有我们的国防文学呢?”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我们,引者注)觉得苏联的‘国防文学’好,就介绍到中国来了。”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

⑮1929—1935年,周扬共有翻译作品25篇,译介论文22篇,其中与俄苏文学相关的共19篇,与美国无产阶级文学相关的共9篇。参见吴敏《周扬年谱初编(一)》,《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⑯参见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周扬文集》一,第26页。

⑰⑱⑳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周扬文集》一,第274、272、266页。

㉑㉒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周扬文集》一,第253、253页。

㉓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周扬文集》一,第291页。

㉔周扬:《略谈爱国主义》,《周扬文集》一,第243页。

㉕周扬:《略谈爱国主义》,《周扬文集》一,第243页。

㉖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周扬文集》一,第276页。

㉗周扬认为,国防文学将“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式各样的民族战争的英勇事实,并且指示出只有扩大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瓜分下救出,使它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见周扬《“国防文学”》,《周扬文集》一,第119~120页。

㉘西安事变后,冯雪峰拟委派周扬去日本,但抗战爆发使该计划被搁置了。1937年8月,潘汉年代表党组织与周扬谈话,安排他前往延安。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扬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再一个原因是‘国防文学’的论战路线的关系我处理的不好。因此,我在那里的工作很难做。……革命热情是有的,但工作就很难做了,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参见吴敏《周扬年谱初编(一)》,《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㉙关于周扬刚到延安时与毛泽东的交际,可参考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219页;杜忠明《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167页。在毛泽东鼓励与支持下,周扬先后在延安教育界、文艺界、政界担任了多项要职,具体职务可见吴敏《周扬年谱初编(一)》,《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吴敏《周扬年谱初编(二)》,《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

⑤⑩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②它们是《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1937）、《新的现实与文学上新的任务》（1938）、《我们的态度》《新文学的发展》《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1939）。其内涵主要集中于文学与民主主义运动的关系，提倡文坛的民主作风。见《周扬文集》一。

③⑤⑥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④周扬对新文学的分期的阐述在《提纲》前后有过重大调整。此前他曾将新文学分为从五四到“五卅”，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华北事变，从华北事变到抗战时期三部分。见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周扬文集》一，第266～267页。而《提纲》却将其分为1919—1921、1921—1927、1927—1936、1936年至今四个阶段。见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从时间线上来说，它们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四个历史阶段完全一致。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可见，此时周扬已经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完全当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⑦⑨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⑧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⑩周扬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一吸取外来文化（包含文学）基本上是适合于民族的需要，第二对于固有文学中的优秀遗产，不但没有排斥，而且发扬了，继承了”。参见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⑪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⑫参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二，第534页。

⑬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二，第707页。

⑭毛泽东：《致周扬》，《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

⑮⑯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周扬

文集》一，第298、296页。

⑰参见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1932）、《抗战时期的文学》《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1938）、《我们的态度》（1939），《周扬文集》一。

⑱《提纲》之前，周扬很多文章都认为新文学是直接拿来外国经验加以利用的。例如“中国的新文学创作差不多都是欧化的”（《抗战时期的文学》）；“在文艺修养方面，我们的作家几乎全是受西洋文学的熏陶。一个落后的国家接受先进国家的文化的影响，是非常自然而且必要的”（《我们的态度》）；“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以西洋文学的输入而开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因为接受西洋的学术思想而起来的，新文学的倡始者们几乎都受过西欧文化的熏陶”。（《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参见《周扬文集》一，第238、262、269、274页。而到了《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中，他的表述则变成了“说新文学是完全从西洋输入……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参见《周扬文集》一，第322页。

⑲周扬：《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周扬文集》一，第226页。

⑳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㉑原文是：“现实的和大众的这两种精神正是五四给我们的最好传统。这个传统，散文方面在鲁迅身上，诗歌方面在稍后的郭沫若身上找到了它的代表。”参见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㉒参见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㉓参见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㉔⑳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周扬文集》一，第350、357页。

㉕参见周扬《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周扬文集》一，第226页。

㉖参见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周扬文集》一。

㉗参见周扬《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周扬文集》一。

㉘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